

上山下乡去云南

沈志明自述

一 我决定去云南

当年我去上山下乡完全是自愿的。这首先取决于我的家庭，我的父母在解放前都是饥寒交迫的穷人，他们四处漂泊，居无定所。解放以后，虽然日子过得甚为艰辛，但他们对安定的生活十分满足。我们兄妹几乎是靠人民政府的帮困才长大成人的，上学读书，也都是免费，在心底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抱着一颗感恩的心。于是，听毛主席话、跟共产党走，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成为顺理成章的事。其次，全国上下“好儿女志在四方”、“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宣传教育，给青春年少的我更平添了一份虔诚而又热烈的冲动和向往。

我是人称老三届的中学生（六七届），按当时的政策，至少有40%的人可以留在上海。我是长子，家境又差，是符合条件留下的。我在学校是共青团员、学生干部，那年月的我很单纯、自律，认为干部带头天经地义，况且我们几个学生干部几乎都是如此。于是我把自己派在了上山下乡的名单中，并把前往近郊如崇明农场等的名额让给了其他同学。我知道家里困难，生怕插队落户争工分连累父母，第一次我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不料因高度近视未被批准。父母知道后以为我不会走了，有一次母亲背着我偷偷去找我的班主任老师，看看就此我是否可以留在上海了。当时我是学校毕业生分配小组的成员，老师只得向我“汇报”。那时我也激进，回家一顿数落，父母也不好说什么了。

我报名去云南父母根本不知道，获准后要往家里送喜报，我才告诉他们在家恭候。虽说他们多少有些思想准备，可喜报一到还是显出若有所失的样子。第二天我拿了户口簿自个儿去南京东路派出所迁了户口，人虽在亢奋中，那一瞬间还是闪过一丝茫然的感觉。回家后父亲塞了5元钱给我，说是要走了让我自己去买点喜欢的东西。当年5元可是大票了，抵得上父亲月工资的近八分之一，我第一次攥着那么大的钱时竟不知道怎么花。我在南京路的店里转来转去，结果在中百一店的文具柜台买了笔记本、三年合一的年历片、中国地图、世界地图，另外还挑了两张照相版的《国歌》和《国际歌》，可见当年的“政治”对人的影响之深。

家里穷，我的行装很简单，一只不大的旧纸皮箱把所有的东西全塞进去了。新添的棉衣和雨鞋是旧货市场买的，母亲找了块土布，用手缝了件外套。唯一的新物是一双我向往已久的篮球鞋，这使我很满足。

我去的地方当年称为云南省景洪县红旗总场，在祖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境内，澜沧江边上的橄榄坝。原来就叫橄榄坝农场，是“文革”中改的名。邓小平有个弟弟叫邓小初，是该农场初创时期的场长，虽然“文革”中邓小平遭贬，可对此人们始终津津乐道。1969年至1974年，红旗农场改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建设兵团一师四团，从上到下都由现役军人当一把手，当然生产还得靠地方干部。当年那儿“派性”严重，又有大批知识青年到达（西双版纳地区共有来自上海、北京、重庆、昆明的知识青年近6万），再说地处边陲，恐怕这样做也是权宜之计。但是这样做实际效果并不好，部队干部的口碑极差，这是后话。1974年后又恢复原体制，仍叫橄榄坝农场。

二 踏上征途

1968年12月21日我离沪赴滇，是上海首批去云南的知识青年。当年全市10个区，每区约100人，共1000人左右。我属黄浦区，是培光中学，我们学校去了5个人。仿照部队做法，一个区为一个连，10人左右一个班，共10个班。我被区里指定为该连四个学生干部之一，另外区里还组织了一个工宣队（由产业工人组成，“文革”中被派往学校，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）小组护送我们，云南农垦局则在昆明迎候。因为是首批，当地统称我们“老上海”，以后陆续到达的上海知青便称“新上海”，至今大家见面还会问一句：老上海，新上海？

21日上午，我们按规定从学校集中后来到山东路体育场（现在已是一座体育馆了）参加欢送我们的大会。会场上标语口号、红旗锣鼓、热闹异常。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播放着拨人心弦的激昂歌曲，把我们的青春激情充盈得鼓鼓的。那一年我18岁。中午，我们乘坐大客车陆续到达北火车站准备启程，装满行李的车皮早已挂在了专列的后面，专列是硬座车厢，每人一个座位，按班就座。火车站同样热闹，送行的父母兄妹，老师同学已经在站台上等候，不大的站台显得熙熙攘攘。我因“公务”在身，几乎没有与父母说什么话，直到列车启动，我才探出身去向他们道别，只见母亲用劳作而粗糙的手不时地在抹眼睛，显然她又哭了。

此后10年，那两条远去的铁轨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当然红旗锣鼓的光荣仅此而已。北火车站也屡屡奏起一代人的离散之曲。因为边疆生活的艰苦，知青们每每回去都会相互托带许多东西，为省几个钱多半也不托运。因此上车抢占座位上方的行李架，并为此动粗伤人的事屡见不鲜，成为当年火车站送客之一景。那一趟列车（79次往昆明）与北行黑龙江新疆的时称“强盗车”，每每使身临其境的家人坠坠不安。有一次我探亲回去看到这样一件事：为安顿好20多只纸箱东西，送行的人蜂拥而入，争执互殴，最后被“文攻武卫”¹叫去写检查。直到此时，大家才发现送的是同一个人，彼此不禁哑然。

在列车上有件事应当提一下。我们南行至杭州时天已黑，正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，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……”的指示就是在此时首次播送的，由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。在我们之后，如68届69届的中学生则全部要下乡，称为“一片红”。

那时对于领袖的“最新指示”必须采取雷厉风行的态度，虽然第一次远离父母的知识青年们大多还泪眼模糊，可还是立即组织了学习，并要求大家谈心、表决心。其实这样的学习多如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，当然也令青春激情再次燃烧。乘着领袖最新指示的东风，迎送我们的锣鼓始终不断，无论吃住行人们接待得也很用心，直到农场生产队，以后的知青就没那福份了。

火车途径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，于24日上午把我们送到了昆明，整整两天三夜。昆明火车站还在建设中，我们几乎是踩着路轨出站的。云南方面安排我们住在昆明工学院（现为云南理工大学），晚上还招待我们去看戏，记得是云南花灯什么的，在什么剧场忘了。“文革”中云贵川是武斗的重灾区，我们住的附近几无商市，很破败。夜里更是漆黑一片。在街上，武斗的痕迹随处可见，建筑物上有枪弹的孔洞，工学院一个大楼的屋顶和墙都掀起了一大块。

在昆明小作休整后，26日我们换乘汽车继续赶路。昆明到景洪，翻山越岭有近800公里的路程。那是一条通往边境的三级公路，坡大弯多路险，车在盘山绕谷的公路上整整颠簸了3天。我们坐的是长途客车，每人一个座位，行李另有汽车运送。这也是对我们的优待，后来的知青都是二三十人一辆卡车，坐在随身的物件上，卡车后面挂个拖斗载行李。

云南的大山里冬雾浓得化不开，连空气都是湿漉漉的。我们坐车一头钻进了大雾里。

¹ “文革”中上海民兵一度为“文攻武卫”取代，常常被派出协助维持治安秩序。该组织实质是当年工人造反派的准武装，被“四人帮”控制，其取名来自江青的一次讲话，意即造反派可以武力卫护自己。结果引起武斗升级。

尽管车前车后黄色的防雾灯都亮着，但望出去还是影影绰绰的，只是觉得颠。其实这不是最难受的，难受的是迷雾散尽烈日当空时。车在山道上跌跌撞撞地前行，艰难险阻尽收眼底，令人担惊且不说，那扬起的尘土更是恼人，它随着你的车紧随不舍，两车一交汇，两股烟尘冲天而起，迷漫得人睁不开眼睛，喘不出气。车辆往来不绝，冲天之尘此起彼伏，一天下来，涂抹得你仅有五官的几个孔依稀可辨，整个儿成了“土人”。最危险的是在雨季，泥石流和塌方的事往往防不胜防，车轮常常要套上防滑铁链行进，我后来也有被困或遇险的经历，这就不说了。值得庆幸的是在知青 1978 年底 1979 年初潮水般地大返城时，却没有听说有什么险事。那时候知青们难民一样地拦车爬车，车上堆满行李后，人几乎坐到了顶蓬上，大家抓着、吊着铁栏车架，有的还怀抱婴儿。在大山里颠簸的那个险，而今想起仍令我感到后怕。

29 日上午，我们顺利抵达景洪。景洪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首府。说是首府，那时只是个边境小镇，一条十字街，最高的房子是街口的百货公司，才二层楼。一家电影院已算是现代化的了（不过“文革”中大多是喧嚣的会场）。在我们这些上海知青破天荒地光顾之后，这儿开始喧闹起来，直到知青闹回城时，罢工、集会、请愿，这个地方都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。

我们这些落户橄榄坝的知青，在第二天（30 日）上午坐船顺澜沧江下行，直奔农场场部。澜沧江流经橄榄坝拐个小湾，径自奔腾出境，改名湄公河。当时农场与景洪不通公路，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。船不大，用柴油机作动力，客货两用。初次在激流险滩坐船，我感到惊险和新奇，两岸的热带雨林很繁密，还见有猴子在江滩上嘻水打闹。到了农场，照例是欢迎会，午饭后，我们这个“连”就散了，大家各奔东西。工宣队还挺负责的，随后几天，他们还到各个生产队巡视了一遍，和知青们照了张相，到农场后的第一张照片我还珍藏着。

三 初到农场

黄浦区和静安区的 200 名知青来到橄榄坝农场后，分别在四个分场，即一至四分场，时称东方红、红卫、沧江和前进分场。我分在一分场五队，共 11 名知青。五队在一个山坳里，离场部步行需一个多小时，30 日的傍晚，一辆拖拉机挂着个大拖斗，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送到了队上，见人们都涌到场地上来看热闹，有人连忙高呼：“向贫下中农学习！向贫下中农致敬！”人们于是鼓掌起来，场面还挺火爆。从农场、分场到生产队的路口，都有用树杆竹子支起的牌楼，彩纸衬着欢迎我们的标语。生产队专门为我们新盖了一排茅草房，三人一间，20 平方米左右。草房用干茅草片覆顶，有几根树叉插在泥地里撑起房顶，四周是竹笆围起的墙，门也是竹笆做的。屋里，星星点点的光亮满屋都是。床也用大毛竹插在泥地里作支架，再铺上竹笆而成。这样的茅草房当年随处可见，我在那儿工作常有变动，多半都住这种房子，举家返沪时也是从茅草房里走的。生产队给我们每人发了几样东西，一把锄头，一把砍刀，那是劳动工具，一张小板凳，是开会学习时坐的，一盏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，那时没有电。我们属农场的正式职工，定为农工一级，出工一天有 1.02 元，做一天算一天，直到 1974 年才因岗位职责不同有所区分。

生产队有个“三忠室”，当晚队里就在“三忠室”为我们开了欢迎会，还杀了猪，摆了些热带水果招待我们。“三忠室”是“文革”的产物，“三忠”指忠于毛主席、忠于毛泽东思想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当年风行早请示晚汇报，农场的每个队都设有三忠室。欢迎会上，我们每个人拿出一枚带去的领袖像章，一起别在红布上，恭恭敬敬地献给了三忠室，自此知青生活开始了。

初到农场，有两件事对我的印象深刻。一是生产队组织我们吃忆苦饭，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。忆苦饭无非是弄些野菜放在一起煮，并无新鲜可言，那年月也不是第一次吃。有意思的是为我们做的忆苦思甜报告，报告人列举了自己在旧社会的种种苦难后，居然一路

讲下去把三年自然灾害（1959—1961年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）也数落了一番，接着她又说，毛主席让我们搞“三自一包”（即农村的自留地、自留畜、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）过好日子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……按当时的宣传显然是搞反了弄乱了，但人们听之任之。回想学校的教育，我们不免面面相觑。农场的职工多是招工来的农民，其中湖南移民占了大多数，在他们看来是非曲折是那么简单而实在。

二是农场当年以“痛打落水狗”的名义批判走资派牛鬼蛇神。众所周知，鲁迅有“痛打落水狗”一说，那儿的造反派竟借此导演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“活剧”。西双版纳的旱季几个月不下雨，从澜沧江边上有个长长的大土坡，车行人走牲畜踩，积起的尘土有几公分厚。那天一早，“牛鬼”们都被驱赶到江边，担水把大土坡浇透。在近45度的长坡上来来回回地担水，个个都累得精疲力尽时，造反派一声喝令，走资派牛鬼蛇神们立刻报着自己的罪名，纷纷从坡顶翻滚下去。两旁的造反派使出了种种招数群起攻之，当“落水狗”们带着浑身泥浆滚到坡底时，早已是鼻青眼肿伤痕累累了，随后再押着批判游斗。这样的“痛打”不止一次，令我们大开眼界。

我们分场的党委书记，曾被一伙人以同样的名义抛到半干的鱼塘里痛打，险遭不测。有知青见了上前干涉，与之论理，造反派不服。知青说：“我们是来自‘一月革命’风暴策源地的红卫兵（‘一月革命’指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市委市府的权，受到毛泽东的肯定的事），你们想干什么！”居然唬住了他们。后来书记官复原职，对上海知青们呵护有加。可从此以后，他落下了头痛的毛病，发作起来常常撞墙以求解脱，真是痛不欲生。

四 知青生活杂记

当年吃相：生产队的伙食极其单调，餐餐顿顿不是卷心菜就是茄子，几个月不变。尤其那大如灯泡的老茄子，煮熟之后，皮就可以剥离下来，如半透明的塑料膜，几乎嚼不烂。有时连这也吃不上，用开水兑点盐巴下饭，名曰“玻璃汤”。或是撒上几片韭菜叶，便戏称为“九（韭）菜一（叶）汤”。

有一年我参加一个工作组下生产队，司务长不知从哪儿变出半桶鸡蛋汤款待我们。这充其量只放了两个鸡蛋的汤，热腾腾的让我垂涎欲滴。我扒了几口饭便迫不及待地去捞汤里的蛋花。荡漾在水里的蛋花薄如蝉翼，细如发丝，随着汤勺下沉而聚集起来的蛋花，肚里的馋虫涌动着。可一提勺，密集的蛋花似充满灵性的游鱼，即刻成群结队地溜走了，捞着的寥寥无几。我装作口渴，一气喝了两大碗汤，可仍两眼发直，用勺追逐着蛋花，直到有人调侃说要不要用漏瓢时，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汤勺，想起脸皮肚皮的孰轻孰重。

又有一次，一夜之间生产队的几头猪全没了耳朵和尾巴，光溜溜的象个滚动的大冬瓜。场部派人一查啊，原来有知青为解馋，趁夜深人静时下的手。东窗事发，当事人免不了作检查受批评，但是没了耳朵和尾巴的猪倒因祸得福了，因为少了抓手，谁也擒不住它们，几次躲过了遭宰之劫，多活了好久。此事一时传为笑谈。

逛寨子：橄榄坝的生产队与傣族村寨毗邻，鸡犬之声相闻，彼此时时往来。收工后，一行人背着挎包，在斜阳里踏着橡胶林间的小径直奔寨子。到了寨子，便一个竹楼一个竹楼地转。知青们逛寨子主要是搞吃的，凭着几句简易的傣语与粗通汉语的老傣谈货论价。受“文革”影响和交通闭塞的原因，当年的日用品很紧俏。知青们带去的线团、电池、胶鞋、帽子都可以换吃的，如水果蔬菜和鸡鸭等等。和纯朴的老傣打交道其实很有趣，他们的买卖论个不论斤，花生也是以一角钱为单位卖，付一角数几粒，不能统算。青菜是一把把扎好卖的，不用秤。你买它的芒果，尽可以上树去吃，只要藏起的果核不落地，不会要你钱，当然无意间碰落的，哪怕是别人吃剩的果核，你都得买。

老傣很好客，去的多了与年龄相仿的男子会成为“老庚”，即同庚的好朋友，到时待你

象亲兄弟一样。我平生第一次喝烈酒，便是在一位老职工的老庚那儿。逛完寨子回到队上，天早已黑完了。挎包鼓鼓的，于是生火开灶犒劳辘辘的饥肠。逛寨子是当年知青们常做的功课。

遭遇蚂蟥：有天收工了，在抬脚越上田埂时，脚上沉甸甸的。“蚂蟥、是蚂蟥！”有人提醒说。我下意识地蹲下身去，一触摸，滑溜溜、冷飕飕的，象一个大鞋襻搭在脚背上。我慌忙在田头扯了把草裹上去，几番猛抠，蚂蟥终于滚落下来。定神一看，蚂蟥灰绿滚圆，足有18多公分长，在草丛里笨拙地挪动着身子。此时我被吮吸过的脚趾流血不止，好在不怎么疼，微微有点痒。

我学着别人的样，把蚂蟥翻串在硬枝上面，再插到田埂上，以置其死地。翻串的蚂蟥血淋淋的，竟有尺把长，着实吓了我一跳。“云南十八怪，蚂蝗能当裤腰带”，就是指这种个体硕大的水蚂蝗。

其实，在西双版纳最令人可恼又无奈的是生活在山坳里的旱蚂蟥。胶林的阴湿之处更是旱蚂蟥的肆虐之地。其时我妻子是割胶工，每天进出林地好几回，流血的创口自然天天有，甚至耳垂、脖颈或发根处也会意想不到遭遇蚂蟥。有时回到家中，贪婪吮血的蚂蟥仍在你肌肤上蠕动，须大力拍打，方可驱逐。

和水蚂蝗相反，旱蚂蟥小得出奇，细如绣花针。尤其在雨季，它遍布树丛草泽的枝枝叶叶上，凭借了很好的保护色，难于察觉。那时上山劳动，大都要穿上蚂蟥袜来防范，蚂蟥袜用厚布缝制高及膝盖。即便这样，只要人一经过，旱蚂蟥仍会伺机攀缘到你身上。偶尔的一次风吹草动，它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飘落进你的衣裤里，钻入皮肉，吮吸血液。有人还被它潜入私处作祟，弄得哭笑不得。蚂蟥的唾液有抗凝物质，被蜇处流血不止更易感染。版纳雨季多病，这是个重要原因。

龚杏娟之死：我调场部机关工作不久，在一个雨天偷闲回生产队会朋友。来到我熟悉的竹笆茅草房，竟空无一人，心里不免诧异。天黑了，我随便找了个铺位睡了。其时，隔了层篱笆墙，有位死者就躺在我身边，一晚上我们几乎“同床共眠”。事后我才知道，不少人迟迟不归，是躲避死人。

死者就是龚杏娟，上海女知青。按当时惯例，原来一个学校的学生都分配在一起，龚杏娟却是不久前从别的农场调来的。她独自一个人，更显得举目无亲，默默地上工，默默地收工，很少与人说话。她长个胖乎乎的圆脸，扎着草率的短辫，和人对视时，难得露出一丝笑意，显出几分病态。她身体还算结实，只是赤裸的双脚溃疡很重。下葬那天，没有一个亲人来送葬，盖棺钉钉，一丘红土覆盖了事，真正的丧事从简。至今，我不知道她是哪个学校的？为什么远离同伴独自来到这陌生的地方？家人为何没有来送葬？是什么病结束了她如花的生命？或许，难得的一丝笑意，是她留给这个世界仅有的美丽了。据说在病死前，正逢队里杀猪，她还吃了一大碗肉，女知青们都惊异她的胃口。

不久，听说她的家人要一张她墓地的照片，于是，我领了这份为她塑碑的差事。说是塑碑，其实是用纸和木板糊块碑，再插在埋她的泥地里，搪塞墓照罢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倒象块蹩脚的牌位。

关平兄弟：有一年，我们生产队里新来了一位上海知青，他姓陈，叫关平，从西双版纳一个叫官坪的地方调来。官坪也常被称作“关平”，这就与关平兄弟同名了。关平兄弟留个平头，白白净净的，长得挺秀气。他说话慢条斯理柔声随和，十足的书生模样。他劳动似乎不太卖力气，那年月不得宠。朝夕相处之后，人们惊奇地发现关平的身上有多处伤疤，其中头发深处缝合皮肤的针脚依稀可见。他说他离开上海后，在官坪的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，因打架斗殴几乎九死一生，伤痕累累之后又被分配到这儿。私下里他与人说，离开官坪的时候，他在公路的一棵树上，特意用刀刻了“关平”两字。其实当年知青打架斗殴是常事。事过境迁之后，大都释然了。想见这段人生经历于关平却是刻骨铭心的。

听说，关平他们的生产队是新组建的，几乎全由知青组成，知青们来自上海和四川。初来乍到，无意间有些摩擦，接着升级为打架，最后的群架打得你死我活，难分难解。一会儿上海知青把四川知青追打出生产队，一会儿退守山林的四川知青结集谋划后又冲锋反击。棍棒砍刀相向对峙，仇恨伴着流血滋长着，人性之丑恶也随之弥漫开来。起初女知青们害怕躲避，啼哭劝解，后来规模扩展，殃及她们。无奈中，她们便卷入其中，倾其所有，尽其所能资助冲锋打架的男知青们，为他们做饭洗衣，伺候伤者，大有同仇敌忾的架势。最终，这个队的知青全部被遣散到西双版纳的东西南北中，让崇山峻林和时间老人去消解一切。

关平兄弟获准回沪探亲后，再也没有回到农场，从此杳无音讯。在云南时，我不止一次地路过官坪，每每都会想起关平兄弟，可终究不忍去寻找他刻字的那棵大树。以男儿的勇气和热血，他足以成为保家卫国的英雄，以他的灵气和执着，游历浩繁卷帙，或许可以是一位翩翩学者。如今，我只能说：关平兄弟，你还好吗？